

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

侯建新 主编

社会转型时期的 西欧与中国

侯建新□著



济南出版社

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 ■

侯建新 主编 □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侯建新 □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侯建新著. -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8
(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侯建新主编)

ISBN 7-80629-594-1

I . 社…

II . 侯…

III . 社会发展 - 对比研究 - 中国、西欧

IV .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772 号

责任编辑 张元立

封面设计 戴梅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邮编:250001)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360 千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总序

齐世荣

《经济社会史丛书》(第一辑)即将出版,主编侯建新邀我写一篇序言。写序实不敢当,但我对作者们勇于开拓史学新园地的精神十分赞赏,故愿借此机会略谈一些感想。

传统的史学,无论中外,都以政治史为中心。在西方,经济社会史作为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已经逐渐成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我国,这个新分支正在兴起,还处于初期阶段。但是一门学科,不论多新,都不可能是平地起楼台的,必有它的渊源。

在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社会史早就存在了。把经济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作综合的研究,西方史学界一般认为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1893 年,维也纳的学者们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季刊》。1929 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明确提出了要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其实,对历史中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视,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并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表述。《资本论》第一卷是经济学理论著作,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经济社会史

著作,因为其中许多地方讲到工作日、工厂制度以及工资立法的发展历史等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贡献,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中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① 美国学者伊格尔斯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而运动的思想以及力图找到历史现象在其中发生的结构要素,把这些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联系起来,系统地阐述可以分析造成变革的各种因素的概念模式。”^②

在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也是以政治史为中心,但古代一些卓越的史学家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其他国家的史学史上是很罕见的。司马迁著《史记》,在八书中有《平准书》,在列传中有《货殖列传》。他试图用经济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并把经济发展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具有卓识。班固著《汉书》,在十志中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② (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页。

有《食货志》和《沟洫志》，前者为研究周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后者系统地叙述了秦汉的水利建设。杜佑著《通典》，分为九类，把叙述经济财政的《食货典》列于首位。

以上简略地说明了经济社会史这门学科的学术传承。我之所以作这样的说明，是有感而发的。今天有些青年好骛新奇，看到一种新学说、新理论，就以为旧学说、旧理论一文不值，可以抛弃了。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已经过时了。这种不加分析的、盲目的“喜新厌旧”是十分错误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新学说、新理论有时胜过旧学说、旧理论；有时反倒不如旧学说、旧理论，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忘掉了；有时新旧可以并存，并无代替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看到一种新学说、新理论、新学科的时候，正如对待一切事物一样，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认真研究它的内容。

纠正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偏颇，并不等于说政治史就不重要。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作用于经济。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研究。恩格斯在 1890 年 10 月 27 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如果巴特尔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有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章，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章（第二十四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

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① 今天，跨学科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有人认为经济社会史是历史学中的一个新分支，有人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不管把它定位在前者还是后者，我们在研究历史时都应当注意经济、社会因素与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否则就会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就不能从其他学科吸取营养。

《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第一辑）的五位作者都是中青年学者，各有专长，又互相切磋。我希望他们能逐渐激励队伍，在我国形成一个研究经济社会史的科学群体，把这门学问发扬光大起来。我对经济社会史没有作过专门研究，以上赘语聊述所感，权以为序。

2001年5月3日于北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04～705页。

目 录

1	引言 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概论
32	第一章 何谓资本主义
32	一、“资本主义”概念
34	二、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主要流派
51	三、小结
52	第二章 资本来源：个人财富的普遍积累
52	一、“前原始积累”
55	二、土地产出率的增长
59	三、“边疆运动”
68	四、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
91	五、生产与贸易，“内贸”与“外贸”

99	第三章 谁为“积累”提供保障?
99	一、西欧法律体系与庄园习惯法
103	二、劳役量限定与法庭裁判
112	三、王权非生产性消费与“王在法下”传统
117	第四章 特权城市与农奴制解体
118	一、建城：挣脱农奴制
135	二、特权城市举证：兼评《中世纪法国公社》
156	第五章 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
157	一、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
164	二、人文主义与时代
170	三、个人与上帝直接对话
175	第六章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176	一、社会交往的变化
182	二、富裕农民群体兴起
189	三、阶级结构的变化
194	四、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
203	第七章 从主体权利看中西传统社会之异同
204	一、西欧：原始契约性贵族等级制

210	二、中国：宗法性官僚君主制
215	三、中西等级制度异同比较
222	第八章 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222	一、宋代劳动生产率考察：兼评“贸易决定论”
236	二、鸦片战争前劳动生产率暨农民个人力量考察
260	三、近代冀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储蓄率考察
284	第九章 农业雇佣经济与雇工比较
284	一、农业雇佣经济比较
297	二、雇佣经济发展与不发展探究
303	三、雇工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比较
309	第十章 乡村基层组织比较
309	一、乡村基层组织及其管制
316	二、乡村诉讼与村规
322	三、乡村精英阶层分析
333	第十一章 近代农民生活与消费水平比较
334	一、民国年间冀中农民的生活与消费
351	二、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

369 第十二章 从英国历史看传统农业变革目标

370 一、农产品剩余培育出世界第一批乡村
工业

374 二、高产农业探源：变革历程与目标

382 三、家庭农场主应成为当代中国农民企
业家主体

389 附 录 国内关于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综述

433 参考及供进一步阅读书目

447 后 记

引言 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概论

一、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起始年代内 容

从传统农业世界转向现代工业世界，大概是人类社会迄今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次社会转型，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大转变的起点始于何时，历史学家各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以 15~16 世纪作为大转变起点的说法较为普遍。眼下，以某次革命或重大政治事件作为标志的观点依然存在，不过似乎不再占主流地位，人们越来越看重普通民众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化所蕴示的深层含义，可是，经济和社会方面比在其他方面往往更难发现类似“接缝”那样的痕迹，因而也就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时代分界线。也许本来就不存在一条明确分界线。用 F·W·梅特兰的话讲：“历史看上

去确实是一张无接缝的网。”^① 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克拉潘则称：“历史是一件无缝的天衣……这件历史天衣的变化往往是极其缓慢而难于察觉的。”“可是，16世纪初所能追溯的那些变化却不能忽略，这些变化几乎暗示出一道接缝和一块新的材料。”于是，他索性将大转变的起始时间定于公元1500年^②，相信不会有太大误差，而且容易记忆。此种观点及时代分界线的确定似乎未尝不可。

这一大转变在空间上发祥于何地，亦有定论。资本主义起源于欧亚大陆的西端，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则是中国；远东和远西恰是我们要进行对照和比较的两个不同范式。中国步入社会转型，是在与西欧几乎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其运行轨迹及转型期的起止年代亦不相同。如果说19世纪中叶后以英国为领头羊的西欧国家依次完成了工业化，那么中国的社会转型时至今日仍在进行中。用“工业化”这个标题来概括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已为经济史和社会史学界广泛接受。可是，“工业化一旦开始进行之后，必然会被破坏传统的前工业社会”^③，从而加深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的差别与对立。

因此，社会转变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非经济领域，诸如知识增长和各级教育水平提高，群众性政治参与，

① 转引自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2页。

② 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57页。

③ Clark Kerr et al. ,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lifornia , 1973 , p.42.

社会动员、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各个方面。西方现代化研究中的结构功能学派因强调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转变而取得很大影响。他们认为，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性，就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性。这些特性可大致概括为：(1)民主化；(2)法制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①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由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这几方面的发展不是同步的，可也不能快慢悬殊过甚，过分的不平衡最终会损害发展较快的指标，从而影响以至打断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往往重视经济的、可测量的指标而忽视“软指标”。例如，单就工业化而言，前苏联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是可观的，教育普及率和知识科学化的水平也不低，但有的环节却相当薄弱，结果严重失调，不得不“休克”治疗。显然，社会转型是一个包罗宏富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罗荣渠对此已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评析，应当成为后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②

① 杨国枢：《现代化的心理适应》，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78 年版，第 24 页。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一编，第一章。

二、工业化是一种偶然？

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或者说让我更迷惑因而更有吸引力的问题是，这一切最初是如何启动的？如果不是上帝之手，那么是何种动力使英伦三岛继而使西欧捷足先登，率先跻身于工业化之路？他们的成功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因素和原则，还是一种偶然？有无普遍性是有无可比性的前提条件之一，没有统一性，中西社会也就谈不到比较。

新近读到的一篇文章表明，把英国工业革命归因于一种资源的发现因而实为一种偶然的观点，仍然不失为一大流派。这篇论文的作者是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教授，据说该文反映了他的《大分流》一书的基本观点，而后者最近因获得颇有地位的费正清奖而在美国史学界走红。他认为：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即“欧洲奇迹”，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西欧与新大陆的关系（被称为经济发展区与边陲地区的关系）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欧胜出。他说：

“这个突破需要技术的创新以及地理条件的配合。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市区内对煤需求量极大，并有一批从事马达、蒸汽机等机器改良的工匠，对发展煤业极有助益。反观中国，煤藏量最丰富的地区是陕西，距离长江三角洲超过一千哩，就像如果欧洲的煤产大部分都在喀尔巴阡山脉下。技术的挑战也不同。英国的矿藏需要不断把水抽出去，而燃煤蒸汽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后来机器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了。……相形之下，中国最大的煤藏在矿井深处，通风是一

大问题。如果不是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我们难以想像(英国——引者注)早期如何突破有机经济的限制;很可能看到西欧就像长江下游一样,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压力下最后将吞噬精密分工的成果。”

另一项“突破”是指新大陆等殖民地的开发与利用。新大陆不断增加的出口商品如矿物燃料、糖、棉花、谷物、牛肉、木材等,缓解了西欧土地资源的紧张程度,例如,“如果1801年英国所消费加勒比海地区的糖完全要在当地生产的话,英国需要用85万英亩至120万英亩的小麦良田来种植甘蔗”,在那样的情况下英国也会像东亚一样走上劳动力密集的道路,“结果可能会使某些突破(如工业革命——原作者注)不可能发生。”^①

彭慕兰从能源的角度探讨英国工业革命,并利用中国经验检视欧洲,是颇有新意的。彭氏把煤矿尤其浅层煤矿认作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问题是:中国并非不存在这些条件: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煤炭的最早记载,宋元时期已较为普遍使用。煤炭交易活跃,宋代“石炭”矿产设有专官管理,并曾实行专卖。河南鹤壁市宋代煤矿遗址规模颇大,可同时容纳数百名矿工工作,布局井然,技术可观:“跳格式”开采法、提水技术等都达到一定水平。宋人沈括预言,作为能源,煤炭比林

① 见 Kenneth Pomeranz:《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系》,该文为2001年5月20~22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笔者有幸做他大会报告的评论人,遗憾的是临时因故未到,未能当面请教,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书面交流。

木更有前途，“此物后必大行于世”。^① 鹤壁矿是地下矿，而且不是中国人开采的第一个地下矿，按顾炎武考证，两汉时即已开采地下煤矿了。^② 其实人们使用和开采煤炭，总是从使用“露头煤”开始，从地表到地下是一个飞跃，也是长期实践的结果。显然，在开采地下矿以前中国就开采浅层矿了，而且势必存在着浅层矿。事实上也是这样。中国不仅有彭慕兰言及的位于陕西等处的深层煤矿，也不乏他十分感兴趣的浅层煤矿，例如距长江三角洲不远的山东枣庄煤矿就是著名的“露头矿”。1801年（嘉庆六年）矗立于枣庄的“窑神庙碑刻”即《创建窑神庙记》载道：“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朝万历间，迄于今，掘取殆遍”，也就是说，自16世纪中后期始，枣庄浅层煤矿就有开采的记载，此时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二三百年前。

笔者向彭慕兰要提的问题并不复杂：中国不缺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为什么这些煤矿没有使中国发生工业革命，或者说没有使中国免于走上劳力密集的道路？另一个就英国工业革命而言更直接的问题是，“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为什么在18世纪中叶以前未被发现和利用？“发现”也是一种偶然吗？当然彭氏

① 春秋战国时代的煤炭记载见于《山海经》，煤炭被称为“石涅”或“涅土”。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煤炭逐渐成为并不罕见的燃料，宋代实行煤炭专卖，开封一带有普通百姓用煤取暖做饭的记载。见《宋史》一百八十六卷《食货志》。《梦溪笔谈》有关于陕西西北部“鄜延境内”（今陕西省富县和肤施县境内）煤矿的记载，言及“选煤人盖知石烟之利也”，并预言作为能源比林木更有前途，“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石炭》。